

诸葛亮 与蜀文化 (一)

四川大学出版社

成都市诸葛亮研究会
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编



诸葛亮的 蜀文化 (一)



成都市诸葛亮研究会
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编

四川大学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:李跃丽
责任校对:成 杰
封面设计:唐利民
责任印制:吴雨时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诸葛亮与三国文化.1/成都市诸葛亮研究会编.
成都:四川大学出版社,2001.5
ISBN 7-5614-2117-6

I. 诸... II. 成... III. 诸葛亮((181-234))
-人物研究-学术会议-文集 IV. K827=36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25402 号

书名 诸葛亮与三国文化(一)

作 者	成都市诸葛亮研究会 著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
出 版	四川大学出版社
地 址	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(610065)
印 刷	西南冶金地质印刷厂
发 行	新华书店经销
开 本	850mm×1168mm 1/32
印 张	15.5
字 数	420 千字
版 次	2001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0 001~3 000 册
定 价	28.00 元

◆读者邮购本书,请与本社发行科
联系。电 话:5412526/5414115/
5412212 邮政编码:610064

◆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
寄回印刷厂调换。

版权所有◆侵权必究



目 录

三国历史

刘表与荆州	宋 超 / 1
人物品题与三国名士	龙瑜生 罗开玉 / 15
论两晋南北朝人评三国	李兆成 / 42
试论刘备的价值观	贺 游 / 60
三国时期士大夫价值取向的变化影响	林成西 许蓉生 / 77
蜀汉秀才孝廉察举考略	罗新本 / 85
三国的秘书	常崇宜 / 91
魏蜀吴三国改革概论	唐士文 / 97
蜀汉学术考论	段 渝 / 107
论曹魏巩固河西进击蜀汉的威慑战略	徐日辉 / 122
试论惠陵的历史地位	何红英 / 131
金刻金拓《重修蜀先生庙碑》考述	陶喻之 / 144
“魏”心是假，野心是真	赵 炯 / 156
《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》管见	卿三祥 / 162

三国文化

毛泽东谈论三国与诸葛亮	谭良啸 / 168
蜀汉饮食杂谈	吕一飞 / 181
三国时期的服饰化妆习俗	杨代欣 / 191
浅谈三国文化对四川民俗的影响	刘西源 / 203



诸葛亮研究

诸葛亮与夷陵之败	王子今 /212
“法孝直若在……”小议	张晓春 /229
诸葛亮治国思想溯源	高 雷 /236
《出师表》研究	张 东 /242
论诸葛亮开发祁山的历史功绩	贾利民 /254
蜀道线上的诸葛亮文化	梁中效 /261
汉水流域与诸葛亮的政治军事战略	马 强 /274
罗秀书和《诸葛亮八阵图说》石刻	王景元 /285
试析诸葛亮不用魏延之计的原因	杨荣新 /292
蜀汉诸葛亮与前蜀王建六次北伐的比较研究	徐学书 /302
魏延率五千精兵能袭夺长安吗?	任 远 /315
沂南北寨画像石墓年代与墓主问题平议	王汝涛 /322
诸葛亮用人治国之道散论	梅铮铮 /331
评诸葛亮攻刘琮取荆州之议	晋宏忠 /339
木牛初探	赵 彬 向国富 /345
关于木牛流马的若干问题	方北辰 /355

诸葛亮文化

诸葛亮文化心理初探	杜小安 /369
诸葛亮联话	冯全生 /379
明代名人与南阳卧龙岗	张晓刚 /384
虚白道人及其《忠武侯祠墓志》	冯岁平 /389
杨慎与诸葛亮	姜开民 /399
论诸葛亮后裔的敬宗意识	徐国平 /405
诸葛玄行踪考索	王瑞功 /412



《三国演义》与三国人物

世纪课题：关于《三国演义》的成书年代	沈伯俊/424
论彝族民间传说中的孟获形象	江玉祥/434
论“刘葛鱼水情”	付保平/448
从刘备取西川看尊重人才的重要性	高显齐 南治平/459

三国文化旅游产业发展

成都武侯祠园林的特色和保护发展	张丽君/464
发展蜀汉文化旅游产业的思考及建议	孙丹木/474
从魏蜀陇右之战谈西部经济开发	王彦俊/482
诸葛亮学术研讨会历次会议情况	李兆成（执笔）/490
后记	/492



刘表与荆州

宋 超

荆州刺史部为汉武帝所置十三刺史部之一，辖南阳、南郡、江夏、武陵、零陵、桂阳六郡及长沙国。新莽时长沙国为郡，共有七郡，东汉时因之。由于荆州东毗扬州，南邻交州，西抵益州，北接司隶、冀州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。建安十三年（208）爆发的赤壁之战，就是在荆州江夏郡展开的。是役不仅奠定了三国分立的政治格局，也开启了曹、蜀、吴争夺荆州的序幕。但在赤壁之役前，荆州较战乱频仍的中原地区则呈现出一种相对安宁的局势。这种局势的出现，与荆州牧刘表的长期惨淡经营不无关系。

刘表虽然坐镇荆州，“带甲十余万，地方千里”，又有清流名士“八俊”、“八顾”、“八及”之誉，以“西伯自处”，然其“多疑无决”特点常为世人诟病，甚而蒙受“木禺（通偶）”、“坐谈客”之讥；死后不久，嗣任荆州牧的少子刘琮举州而降，与同是继承父业，但能保守江东、抗衡曹操的孙权相比则形成明显的对照。曹操遂有“生子当如孙仲谋，刘景升儿子若豚犬”之感叹。^①如此相左的评价集于一身，探讨其中内在原因，对深入认识刘表之人及此时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当有裨益。

① 分别见《三国志·魏书·刘表传》、《三国志·魏书·司马芝传》、《后汉书·刘表传》、《后汉书·党锢传》、《三国志·魏书·贾诩传》注引《傅子》、《三国志·吴书·吴主传》等。



一

刘表，山阳高平（今山东微交西北）人，字景升，汉室宗室。史称“少知名”^①。年十七，曾从南阳太守王畅而学。王畅因感“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，常布衣皮褥，车马羸败，以矫其敝”。刘表进谏曰：“夫奢不僭上，俭不逼下，循道行礼，贵处可否之间。蓬伯玉耻独为君子。府君不希孔圣之明训，而慕夷、齐之末操，无乃皎然自贵于世乎？”^②“奢不僭上，俭不逼下”之语，当综合了《礼记·札记下》“君子不僭上，上不逼下”及《论语·述而》“奢则不逊，俭则固”之意。显然刘表不取王畅为矫其敝而采取的极端作用，而劝谏太守应以孔子“明训”为诫，勿矫过正，行事处世当取中庸之意。刘表少年时既谙熟儒家经典，应是其“少知名”的一个因素。

刘表的早期仕宦经历，史载付阙。但从刘表十七岁从南阳太守王畅学，党锢解除后被大将军何进辟为掾史，再任北军中候的仕途看，其间适值桓、灵二帝相继当朝之际。是时，正是官僚士大夫、太学生与专权的宦官集团激烈相争，“党锢”盛行。刘表作为刘氏宗室、士大夫之一员，宦官视为“党人”，当属无疑。所谓“八俊”、“八顾”、“八及”之称号（“俊者，言人之英也”，“顾者，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”，“及者，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”），为天下名士“其相标榜”所为。“党人”固然是与“邪枉”抗争的“正直”之士，但也常常具有东汉后期许多士大夫长于品评人物朝政，短于辅政济民，刚直倔强有余，顺通变达不足之通病。诚如范曄所曰：“逮桓灵之间，主荒政缪，国命委于阉寺，士子羞与为伍，故匹夫抗愤，处士横议，遂乃激扬名声，互相题拂，品核公卿，裁量执

① 《三国志·魏书·刘表传》。以下凡引此传者不再出注。

② 《后汉书·王龚传附子畅传》。



政，婞直之风，于斯行矣。”^①虽然不能一概认定所有“党人”都具有这样的品性，但从刘表执政荆州，对祢衡这样典型的“坐谈客”的事例看，或许可以反映出这种风尚还是有所影响的。

服其才名，甚宾礼之，文章言议，非衡不定。表尝与诸文人共草章奏，并极其才思。时衡出，还见之，开省未周，因毁以抵地。表恍然为骇。衡乃从求笔札，须臾立成，辞义可观。表大悦，益重之。^②

然而刘表毕竟在宦海沉浮多年，又任北军中候一职多年^③，积累了相当的从政经验，对其日后治理荆州十分重要。献帝初平元年(190)，“诏书以表为荆州刺史”，出任一方诸侯，从而成为东汉末年政治舞台上的一位颇为重要的人物。

此前，中原局势早已混乱不堪。是年正月，“关东州郡起兵讨董卓，推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”。战事在中原一带激烈展开，迫于诸侯联军压力，董卓于二月裹挟献帝及朝臣迁都长安以避其锋。在迁都过程中，董卓采取残暴手段掠夺人口，劫抢财物，“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，步骑驱蹙，更相蹈藉，饥饿寇掠，积尸盈路。卓自屯留毕圭苑中，悉烧宫庙官府居家，二百里内无复孑遗。又使吕布发诸帝陵，及公卿下冢墓，收其珍宝”^④。荆州所辖的南阳郡，历有“南阳帝乡，多近亲”之称^⑤，因毗邻京城洛阳所在河南尹，

① 以上引文，均见《后汉书·党锢传》。

② 《后汉书·文苑下·祢衡传》。

③ 《续汉书·百官志》：“北军中候一人，六百石。本注曰：掌监五营。”五营，即屯骑、越骑、步兵、长水、射声五校尉所掌宿卫兵卒。《后汉书·刘表传》曰自党锢解除后（灵帝中平元年，184），刘表辟大将军府，任北军中候，至初平元年已达六年之久。《集注》引惠栋曰：“《镇南碑》云辟大将军府，迁北军中候，在位十旬，以贤能特选拜刺史。”两者说法不一，但论六年或十年，皆可证明刘表任北军中候多年无疑。

④ 《后汉书·董卓传》。

⑤ 《后汉书·光武帝纪》。



人口财物损失自然也相当严重。

荆州形势同样也是一片混乱。原刺史王叡虽与长沙太守孙坚、后将军袁术等参与众诸侯伐董卓的行动，但各怀异志，未及先攻董卓，反先自相攻伐。由于孙坚与王叡早就结有宿怨，孙坚趁机勒兵袭杀王叡，继之又诱杀不肯供给其军粮的南阳太守张咨，与袁术合兵于鲁阳（今河南鲁山）。由于得到孙坚的支持，袁术遂占据南阳郡，屯于有“其地重险，楚之北塞”^①之称的鲁阳，试图阻止刘表之州。刘表尚未赴任，荆州已非全璧。不仅如此，“江南宗贼盛，……吴人苏代领长沙太守，贝羽为华容长，各阻兵作乱”^②。刘表正是外伺强敌，内乱不已，“寇贼纵横，道路梗塞”的险恶形势下，仅奉一纸“诏书”，“单马入宜城”，开始长达近二十年经营荆州的历史。刘表这一举动，无疑具有相当的胆识。

刘表既不赴荆州州治寿春（今湖北临沅东北），也不至南郡郡治江陵（今湖北江陵），而首先进入南郡宜城（今湖北宜城），这一赴任路线事先可能也经过一番筹划。寿春虽为荆州州治所在，然而今邻近“阻兵作乱”的苏代所领的长沙郡；至于南郡郡治江陵，与贝羽华容县亦相去不远。刘表先至宜城，可以避苏代、贝羽之锋芒，以免在立足未稳之时即被逐出荆州。而宜城位于汉水北岸，与南郡另一重镇、后被刘表作为州治的襄阳相去不远，可以汉水为依托，抵御占据汉水以北南阳郡袁术的攻击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，东汉后期，地方豪强大族势力迅速崛起，甚至可以左右一方政局；朝廷命官如果得不到地方豪强大族的支持，也难以宰州主郡。蒯良、蒯越兄弟是中卢（今湖北襄樊西南）人，多有智谋，尤其是蒯越更为知名，“深中足智，魁杰有雄姿”，曹操在平定荆州后曾与荀彧书曰：“不喜得荆州，喜得异度（蒯越字）”

① 《三国志集解》卷六《刘表传》。

② 《三国志·魏书·刘表传》注引司马彪《战略》。



耳”^①，对蒯越也很是推崇。蔡瑁是襄阳人，《三国志集解·刘表传》注引《襄阳耆旧传》有“汉末诸蔡最盛”之语。蒯氏兄弟与蔡瑁对刘表的支持，代表了南郡豪强集团对刘表已经认可。刘表当然深知其中底蕴，因此一到宜城，就延请南郡地方豪强大族人物蒯良、蒯越兄弟与蔡瑁“相与谋”。当刘表对荆州局势深表忧虑，“宗贼甚盛，而众不附，袁术因之，祸今至矣！吾欲征兵，恐不集，其策安出”时，蒯良、蒯越兄弟先后献策曰：

众不附者，仁不足也，附而不治者，义不足也；苟仁义之道行，百姓归之如水之趣下，何患所至之不从而问兴兵与策乎？

治平者先仁义，治乱者先权谋。兵不在多，在得人也。袁术勇而无断，苏代、贝羽皆武人，不足虑。宗贼帅多贪暴，为下所患。越有所素养者，使示之以利，必以众来。君诛其无道，抚而用之。一州之人，有乐存之心，闻君盛德，必襁负而至。兵集众附，南据江陵，北守襄阳，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。术等虽至，无能为也。^②

蒯良献策虽然显得空洞无物，但以“仁义”说之，倒也符合刘表“儒雅”的心态；而蒯越之言，为刘表剖分荆州形势，制定“南据江陵，北守襄阳”，以南郡为基础，再定荆州八郡的策略具有现实可行性，更是深得刘表赞许。“子柔（蒯良字）之言，雍季之论也。异度之计，白犯（白通舅，白犯即晋文公重耳舅狐偃）之谋也”。于是刘表使蒯越“遣人诱宗贼，至者五十五人，皆斩之。袭取其众，或即授部曲。唯江夏贼张虎、陈生拥众据襄阳，表乃使（蒯）越与庞季单骑往说降之，江南遂悉平”。初平二年，刘表移治

① 《后汉书·刘表传》注引《傅子》。

② 《续汉书·郡国志》曰荆州有七郡，《汉官仪》曰有章陵郡，故为八郡，但时为建安十八年时事，初平元年尚未置该郡。《三国志集解·刘表传》卢注对此考证甚详，可参见。



襄阳，开始莅临荆州的统治。

二

刘表于初平二年移治襄阳，“以观时变”，只是粗定荆州形势，而近在南阳郡的袁术，并不愿意刘表从此坐大荆州，企图趁其立足未稳之时一举攻灭之。尽管袁术占据荆州七郡中最为富庶、户口众多的南阳郡，但因其“奢淫肆欲，征敛无度，百姓苦之，稍稍离散”^①，反而严重削弱了自身实力。初平三年，袁术指使豫州刺史孙坚围攻襄阳，轻敌冒进被杀。不久，袁术被曹操、袁绍合力击败，率余部逃至扬州九江郡，失去了继续与刘表争夺荆州的资本。而是时各路诸侯在中原地区混战正酣，无暇南顾，客观上也为刘表全力经营荆州创造了条件。刘表得以据境自守，坐观群雄争斗，爱民养士，形成“带甲十余万，地方千里”的态势。

刘表在荆州的成功统治，引起了正“播越”在外的朝廷的重视。兴平元年（194），献帝准备还都洛阳，选遣卫将军董承修理宫室。太仆赵岐说董承曰：

今海内分崩，唯有荆州境广地胜，西通巴蜀，南当交趾，年谷独登，兵人差全。岐虽迫大命，犹志报国家，欲自乘牛车，南说刘表，可使其身自将兵来卫朝廷，与将军并心同力，共奖王室。此安上救人之策也。

此时，全国形势并不明朗，像曹操、袁绍这样势力强盛的诸侯，尚都没有建立自己十分稳固的基业。曹操虽然据有兖州，但吕布趁曹操率军出击陶谦之时袭击兖州，几乎攻下兖州全境，如果不是程昱等人“据城坚守”，力保鄆城、范、东阿三城不失，曹操将

① 《资治通鉴》卷六十《汉纪》五十二。



“无所归矣”^①。袁绍的处境则如其谋士逢纪所说：“将军举大事而仰人资给，不据一州，无以自全。”^②于是袁绍驱逐冀州牧韩馥，夺取冀州为基业。后来占据江东的孙策此时正在率部渡江与扬州刺史刘繇激战；而刘备正寄寓于徐州陶谦的麾下，陶谦死后领徐州牧，在曹操、吕布诸人兵锋的威胁下苦苦求生。曾一度把持朝政的董卓部将李傕诸人也刻意结交刘表，初平三年十月，趁刘表“遣使奉贡”之机，“以表为镇南将军、荆州牧，封成武侯，假节，以为己援”^③。可见是时“海内分崩，唯荆州境广地胜，西通巴蜀，南当交阯，年谷独登，兵人差全”的形势，是刘表一生中最有可能捷足先登，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，成就一代霸业的绝好时机。

然而，刘表并没有这样的政治远见与抱负，虽然在赵岐的游说下，“即遣兵诣洛阳助修宫室，军资委输，前后不绝”^④，但是仅此而已，并没有如同赵岐所冀望的那样亲自将兵“以卫朝廷”、“共奖王室”。袁绍当时没有接受谋士沮授趁“今州城粗定，兵强士附”之时，“西迎大驾，即宫邳都（今河北磁县南），挟天子而令诸侯，稽士马以讨不廷”的建议，待曹操于建安元年（196）将献帝迎至许都，以朝廷名义“下诏书于绍，责以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，不闻勤王之师而但擅相讨伐”^⑤时，又深表后悔。刘表所为，较之袁绍尚且不如，更遑论早有“四方之图”的曹操了。

刘表虽无“共奖王室”的雄心，但拒境自保尚有余力。在刘表的经营下，相对战乱频仍的中原地区，荆州处于相对安宁的状态，加之从东汉初年“中兴以来，荆州无破乱，及刘表为牧，民又丰乐”^⑥，因此，荆州也成为中原士民避乱迁徙的一个重要地区。

① 《三国志·魏书·程昱传》。

② 《三国志·魏书·袁绍传》注引《英雄记》。

③ 《后汉书·刘表传》。

④ 《后汉书·赵岐传》。

⑤ 《后汉书·袁绍传》。

⑥ 《续汉书·五行志一》。



据史载，汉末战乱中迁徙荆州的中原士人主要有：

《后汉书·儒林·颍容传》中颍容，陈国长平（今河南周口北）人，“初平中，避乱荆州，聚徙千余人。刘表以为武陵太守，不肯起”。

《后汉书·儒林·祢衡传》中祢衡，平原般（今山东乐陵西南）人，“少有才辩，而尚气刚傲，好矫时慢物。兴平中，避难荆州”。

《三国志·蜀书·诸葛亮传》中诸葛亮，琅邪阳都（今山东沂南）人，“遭汉末扰乱，随叔父玄避难荆州，躬耕于野，不求闻达”。

《三国志·魏书·刘表传》注引《先贤行状》中韩嵩，义阳人，“知世将乱，不应三公之命，与同好数人隐居于郾西山中。黄巾起，嵩避难南方，刘表逼以为别驾，转从事中郎”。

《三国志·魏书·司马芝传》中司马芝，河内温（今河南温县）人，“少为书生，避乱荆州，于鲁阳山遇贼，同行者皆弃老弱走，芝独坐老母。贼至，以刃临芝，芝叩头曰：‘母老，唯在诸君！’贼曰：‘此孝子也，杀之不义。’遂得免害，以鹿车推载母。居南方十余年，躬耕守节”。

《三国志·魏书·王粲传》中王粲，山阳高平（今山东邹县）人，“年十七，司徒辟，诏除黄门侍郎，以西京扰乱，皆不就。乃至荆州依刘表”。

《三国志·魏书·和洽传》中和洽，汝南西平（今河南西平西）人，以刘表“无他远志，爱人乐土”，荆州“土地险阻”，“遂与亲旧俱南从表”，其后再南徙武陵郡。

《三国志·魏书·杜袭传》中杜袭，颍川定陵（今河南舞阳北）人，“曾祖父安，祖父根，著名前世。袭避乱荆州，刘表待以宾礼”。

《三国志·魏书·赵俨传》中赵俨，颍川阳翟（今河南南阳县）人，“避乱荆州，与杜袭、繁钦通财同计，合为一家”。

《三国志·魏书·裴潜传》中裴潜，河东闻喜（今山西闻喜）人，“避乱荆州，刘表待以宾礼。潜私谓所亲王粲、司马芝曰：‘刘牧非霸王之才，乃欲西伯自处，其败无日矣。’遂南适长沙”。



《三国志·魏书·韩暨传》中韩暨，南阳堵阳人，“隐居避乱鲁阳山中，山民合党，欲行寇掠。暨散家财以供牛酒，请其渠帅，为陈安危。山民化之，终不为害。避袁术命召，徙居山都之山。荆州牧刘表礼辟，遂遁逃，南居孱陵界，所在见敬爱，而表深恨之”。

以上所列当然不能完全涵盖东汉士民徙居荆州的现象，但基本上也能反映出其大致情况。若考虑到有资格列名于史传者，大都是上层士人这一事实，是时徙居荆州的士民肯定为数不少。如《后汉书·刘表传》载：“关西、兖、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，表安慰赈赡，皆得资全。”此处“学士”，当然是指下层士人而言。然而，刘表在荆州虽然自保有方，但统治像荆州这样衔接中原与江南，扼控巴蜀与江东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广泛区域，在天下大乱、诸侯纷起争雄的时代，仅求自保是不可能长久的。上引《裴潜传》所谓“刘牧非霸王之才，乃欲西伯自处，其败无日矣。”正反映出徙居于此避乱的中原士人心中普遍存在的隐忧，同时这也是造成徙居于此的人士情况变化最大的一个原因。

早在建安初年，曹操挟献帝定都许都，朝廷粗定之时，先时徙居荆州的人士，如杜袭“逃还乡里，太祖以为西鄂长”；赵俨“扶持老弱诣太祖，太祖以为朗陵长”，已经陆续有人回徙本郡。建安十三年，曹操兵向荆州，刘表病死，少子刘琮继任荆州牧，旋即投降曹操。在说刘琮降曹的过程中，徙居荆州的部分士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。如王桀在劝说刘琮降曹后，曾对曹操云：

刘表雍容荆楚，坐观时变，自以为西伯可规。士之避乱荆州者，皆海内俊杰也。表不所任，故国危无辅。……及平江、汉，引其贤俊而置之列位，使海内回心，望风而愿治，文武并用，英雄毕力。

是语虽不无有迎奉曹操之嫌，但参之上引裴潜之语，大抵上能反映出这些士人的普遍心态。核以史实亦是如此。上述诸人除诸葛亮后随刘备入蜀，颖容于建安中已卒，繁钦结局不详外，其余诸人



基本上都归属并仕宦于曹氏政权，自然大部分都回徙于中原。有“智士”而刘表“不知所任，故国危无辅”。

三

建安十二年（207），刘备在司马徽、徐庶的举荐下，屈驾三顾隐居于襄阳隆中（今湖北襄阳西）的名士诸葛亮，讨教争霸天下之大势。诸葛亮答曰：

今操已拥百万之众，挟天子而令诸侯，此诚不可与争锋。孙权据有江东，已历三世，国险而民附，贤能为之用，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。荆州北据汉、沔，利尽南海，东连吴会，西通巴蜀，此用武之国，而其主不能守，此殆天所以资将军，将军岂有意乎？益州险塞，沃野千里，天府之土，高祖因之以成帝业。刘璋闇弱，张鲁在北，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，智能之士思得明君。将军既帝室之胄，信义著于四海，总揽英雄，思贤如渴，若跨有荆、益，保其岩阻，西和诸戎，南抚夷越，外结好孙权，内修政理；天下有变，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、洛，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，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？诚如是，则霸业可成，汉室可兴矣。^①

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“隆中对”。其中重点是规劝刘备北不可与“挟天子而令诸侯”的曹操“争锋”，南引“据有江东，已历三世”的孙权为援好，先取“其主不能守”荆州为基业，再兼并“刘璋闇弱”、“思得明君”的“天府之土”的益州，兵分益、荆两路直取中原，如是“则霸业可成，汉室可兴矣”。是前，刘备虽被曹操

^① 《三国志·蜀书·诸葛亮传》。



视为与己并俦的“英雄”，但在天下大乱、群雄逐鹿的局势下，一直漂浮不定，没有一块真正属于自己可以安身立命、徐图发展的基业。建安五年（200），刘备在再败于曹操后，不得不于次年托身于荆州牧刘表的麾下，“表自郊迎，以上宾礼待之，益其兵，使屯新野”^①，始获得一段相当宝贵的休生养息的时机。从这一意义上讲，刘表可谓是刘备的“恩主”。诸葛亮却献策刘备谋夺“恩主”的基业，其中除了刘表“不能守”的因素外，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与荆州所处的战略地位有关。

无独有偶，建安十二年，曹操北征乌桓，彻底消灭了袁绍的残余势力，平定中原后，即有意征伐刘表。曹操“问或所策”。荀彧献策曰：“今华夏以平，荆、汉知亡矣，可声出宛、叶而间行轻进，以掩其不意。”所谓“荆、汉”，是指刘表所言。宛、叶均属南阳郡，宛县为南阳郡治（今河南南阳），叶县（今河南叶县西南）为南阳郡北部重镇。荀彧所曰的“宛、叶”，与诸葛亮所云的由荆州北上直取“宛、洛”，虽然在用兵的方向上有北上南下之不同，但对荆州，尤其是南阳郡战略地位的重视则是一致的。宛、叶之间的通道（或曰由洛阳直达宛城），自秦汉以来，无论是南征或是北伐，一直是必经之道。刘邦与项羽争霸天下、平定九江王英布之乱，就曾数次出兵宛、叶之间。东汉初年，冯衍亦曾赞扬光武帝“以圣德灵威，龙兴凤举，率宛、叶之众，将散乱之兵，啗血昆阳，长驱武关，破百万之陈，摧九虎之军。雷震四海，席卷天下”^②。可见无论是兵向“宛、洛”的北伐，或是“声出宛、叶而间行轻进”的南征，荆州都是必先夺取的首要目标。建安十三年，曹操依从荀彧的策划，兵出宛、叶，直抵襄阳，迫使继任荆州牧不久的刘琮举州而降。

荆州对于孙氏集团所控制的江东，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战略意

① 《三国志·蜀书·先主传》。

② 《后汉书·冯衍传》。